

文物兴衰与朝代更迭

青铜器、玉器和瓷器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代表，作为中国古代手工业艺术品中的代表，它们的发展和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息息相关。因此，不同时期的艺术品呈现了不同风格，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多彩多姿的民族文化。

一. 从青铜器的兴衰看朝代更迭

最近，江西南昌的一项考古新发现——西汉海昏侯墓备受关注，从发现到现在的5年间，考古人员陆续清理出土了包括铜器、玉器、漆器、陶俑、简牍各类文物达1万多件。其中有2盏青铜雁鱼灯，其工艺价值和环保价值最引人关注。

雁鱼灯为青铜材质铸造，整体作鸿雁回首衔鱼伫立状，雁体态宽肥，颈修长，身两侧铸出羽翼，有短尾，双足并立，掌有蹼。雁喙张开衔一鱼，鱼身短肥，下接灯罩盖。整盏灯由雁首颈（连鱼）、雁体、灯盘、灯罩4部分套合而成。雁颈与雁体以子母口相接。鱼身及雁颈、体腔均中空相通。灯盘圆形，直壁，浅腹，内有两道直壁圈沿。一侧附灯柄，可控制灯盘转动。盘下有圈足，与雁背上的直壁圈沿以子母口套接。灯罩设计为两片弧形板，可左右转动开阖，既能挡风，又可调节灯光亮度。鱼和大雁的身体都是空心的，点燃灯油或白蜡后产生的油烟被灯罩挡住，不能乱飞，只能向上进入雁和鱼的体内。专家推测古人在雁腹中注入了一些清水，烟尘可溶入水中。此外，雁鱼灯的四个部分均可自由拆装，以便揩拭和清理烟尘。

雁鱼灯不光做工精美，而且设计合理，蕴含着古代的科学原理，可以调节光线明暗，还能避免燃烧的烟气污染空气。这种类型的青铜灯在汉代墓葬中并不是首次出土，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之墓）曾出土过一盏长信宫灯，宫灯灯体为一通体鎏金、双手执灯跽坐的宫女，神态恬静优雅。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85公斤。宫灯长信宫灯设计十分巧妙，宫女一手执灯，另一手袖似在挡风，实为虹管，用以吸收油烟，既防止了空气污染，又有审美价值。此宫灯因曾放置于窦太后（刘胜祖母）的长信宫，故名。像这一类的铜灯在当时造价极其高昂，不是普通百姓能使用的，有可能是一种只在高级贵族中流通的物件。

青铜器是我国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无比灿烂的青铜文化，中国青铜器以其精湛的工艺和独特的青铜文化成为人类青铜文化史上的华彩篇章。“青铜时代”是指大量使用青铜工具及青铜礼器的时期。保守的估计，这一时期主要从夏商周直

至秦汉，时间跨度约为两千年左右，这也是青铜器从发展、成熟乃至鼎盛的辉煌期。隋唐以后，青铜器作为一个大类已经为铁器及各类其他手工制品和陶瓷所取代，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古代铜器，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贡献，虽然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我国铜器的出现，晚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但是就铜器的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铜器可以与中国古代铜器相比拟。这也是中国古代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并引起普遍重视的原因之一。由于青铜器以其独特的器形、精美的纹饰、典雅的铭文向人们揭示了先秦时期的铸造工艺，文化水平和历史源流，因此被史学家们称为“一部活生生的史书”。那到底什么是青铜呢？

青铜是人类历史上一项伟大的发明，是世界冶金铸造史上最早的合金，是以红铜加入一定比例的锡和铅，成为一种新的合金，这种合金历经几千年的化学反应，其表面出现一层青灰色的锈，所以今人谓之“青铜”，而古人则将这种合金称之为“金”，文献中所讲“赐金”、“受金”多少，即指“青铜”。

先秦中原各国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祭祀和对外战争，《左传》中说：“国之大事，在祀及戎”就是这个意思。作为代表当时最先进的金属冶炼、铸造技术的青铜，也主要用在祭祀礼仪和战争上。夏、商、周三代所发现的青铜器，其功能（用）均为礼仪用具和武器以及围绕二者的附属用具，这一点与世界各国青铜器有区别，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青铜器文化体系。礼器是古代繁文缛节的礼仪中使用的，它带有一定的神圣性，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的。所有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礼乐器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礼器种类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类。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装饰最为精美，文饰种类也较多。

商晚期至西周时期，是我国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器型多种多样，浑厚凝重，铭文逐渐加长，花纹繁缛富丽。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乐器也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礼器是古代繁文缛节的礼仪中使用的，或陈于庙堂，或用于宴饮、盥洗，还有一些是专门做殉葬的明器。青铜礼器带有一定的神圣性，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的。所有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礼乐器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礼器种类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类。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装饰最为精美，文饰种类也较多。比如我们大家熟知的后母戊鼎，就是殷商晚期的青铜器代表作，它通高 1.33 米，口长 1.10 米，口宽 0.79 米，重达 832.84 公斤，是我国现存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后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形制雄伟，气势宏大，纹势华丽，工艺高超，又称后母戊大方鼎。

后母戊鼎铸造的年代正是殷商国力最强盛的时期，富庶雄厚的实力是铸造大鼎的物质条

件。经过专家研究，后母戊鼎是采用传统的范铸法一次性整体混铸出来的。范铸法是中国古代青铜器铸造常用的方法，先用陶土塑模，然后翻范，范做好后，把内范和外范组合成大鼎铸型，中间留出用于浇铸铜液的器壁缝隙。由于后母戊鼎体量巨大，所以铸造时不能按照一般青铜器在地面上进行，而是要先在地上挖一个大型铸坑，大鼎模具的口朝下，有浇注口的鼎足在上，众人配合作业将数个大型坩埚里的铜液同时浇注进浇口。铸造此鼎，所需金属原料超过 1000 千克。而且，制作如此的大型器物，在塑造泥模、翻制陶范、合范灌注等过程中，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同时必须配备大型熔炉。后母戊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显示出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规模与杰出的技术成就，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

西周后期，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内外矛盾日益激化，厉王暴虐，政权为国人所推翻，宣王一度号称中兴，但终不能挽回西周覆亡的命运，王室已失去原有的号召力。到幽王之时，西周政权终于在犬戎和申侯的联合进攻下灭亡。这个时期的青铜器制造一度呈现出回光返照的景象，出现了像大克鼎、虢季子白盘一类的重器，也有很多具有历史价值的长篇铭文。但由于缺少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精神力量为其支撑，也缺少早先那种精益求精的工艺追求，在很多地方不免给后人留下徒有其表的印象。西周政权覆灭后，公元前 770 年新继位的周平王被迫放弃镐京，在晋、郑、卫、秦等诸侯护送下，迁都洛邑（今河南安阳），历史由此进入东周时代。东周分为春秋、战国两个大的历史阶段。

春秋基本的时代特点是王室中衰、诸侯争霸与相交织。战国时期，各国统治者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巩固政权而不得不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作出根本性的抉择，于是有了魏、楚、韩、齐各国的变法。而实行的最彻底的是商鞅在秦孝公时期进行的两次变法，为秦国富强和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青铜器铸造的又一个高潮期。

春秋晚期至战国，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铜制工具越来越少。这一时期的铜器，以各国诸侯和卿大夫的礼器数量最多，其地位越高，享用的数量也越多。除东周王室外，几十个诸侯国都有青铜器流传至今。列国国君及其追随者需要众多的青铜器来铺陈自己的宗庙和室家，借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明示自己的身份。制作工艺方面，除纹饰日益繁杂外，还出现了镶嵌、鎏金、金银错、细线雕等新兴工艺。列国的青铜业在这时候已达到纯熟的地步，虽然发展也不尽平衡，但是整体水准很高。这时期的青铜器在形制、纹饰方面都具有很多的共性，其他地域特征也是明显的。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铸造和工艺技术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成就，但由于冶铁术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的青铜时代最终为铁器时代所取代。

战国时代虽然有了铁器，但绝大部分兵器的一部分工具，仍旧用青铜制造，传统的礼器

也用青铜制造。解放后，战国青铜器出土很多。1957年河南信阳的一号楚墓，曾出土13件一套青铜编钟，有的钟在出土时还挂在钟架上。1974年至1978年河北平山发掘战国时代中山国的几座大墓，出土了大量青铜器。仅一号、六号墓，出土带有铭文的就达90多件，有469字的中山王鼎、450字的夔龙饰方壶、204字的圆壶、450字的兆法图铜板等。这些长篇铜器铭文打破了过去认为战国铜器上很少有长篇铭文的传统看法。铭文内容补充了古籍中对中山国历史记载的不足，对研究中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一些器物还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如四龙四风灯、十五连盏灯、错金银兽、虎噬鹿器物座等，制作工艺细致，造型精美而生动。战国时期，流行错嵌红铜的工艺，是在铜器表面铸造出浅凹花纹，嵌入红铜薄片，再打磨使表面平整，利用两种金属的不同光泽来构成各种图案。青铜器表面嵌金、银图案的“金银错”工艺，春秋时已经出现，战国时特别发达，器物呈现出缤纷富丽的效果。另外的一个重要现象是，由于战国时代互相争伐的战争十分频繁，各国都重视兵器的研制，所以铸造兵器的青铜业，技术水平高超，这时的铜剑十分锋利，矛与戈合为一体而成为戟，可以兼起钩、刺、砍等作用。

总的来说，春秋战国的时代环境早就文化艺术发展的多元化局面，就青铜器艺术的发展状况而言也是如此。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主要是王臣之器，东周时期王臣之器不复存在，主要为列国之器，显示出鲜明的地域性特点。

秦汉时期，随着瓷器和漆器进入日常生活，铜制容器品种减少，装饰简单，多为素面，胎体也更为轻薄。

经过几百年的兼并战争及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封建社会最终建立，传统的礼仪制度已彻底瓦解，铁制品已广泛使用。社会各领域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秦汉青铜器艺术是秦汉艺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发展历程中最后的闪光点。这一时期，青铜器中礼器的比重大大减少，生活用品的种类与数量则急剧增多，钱币、度量衡及铜镜等承袭东周继续发展，并不断有所创新，以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青铜器种类。

秦汉时期，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器物大多日用化，但是具体到某些青铜器，精美的作品还是不少的。如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掘获的两乘铜车马。第一乘驾四马，车上有棚，御者为坐状。这两乘车马均为青铜器铸件构成，大小与实际合乎比例，极其精巧。车马上还有不少金银饰件，通体施以彩绘。第二乘马，长3.17、高1.06米，可以说是迄今发掘到的形制巨大、结构又最复杂的青铜器。

到了东汉末年，陶瓷器得到较大发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从而把日用青

铜器皿进一步从生活中排挤出去。至于兵器，工具等方面，这时铁器早已占了主导地位。但是在上层社会，青铜器依然作为一种身份和财富的象征存在。1969年甘肃武威曾发现一座东汉大型砖室墓，出土的铜器中最突出的是一套铸造精美的武装车马出行行列，和一件昂首扬尾、三足腾空、一足踏在飞燕上的奔马（俗称“马踏飞燕”），奔放生动，别具匠心，现在已被定为中国旅游的标志。

马踏飞燕又名“马超龙雀”、“铜奔马”，出于东汉时期镇守张掖的军事长官张氏及其妻合葬墓中出土，现藏甘肃省博物馆。奔马身高34.5厘米，身长45厘米，宽13厘米。形象矫健俊美，别具风姿。马昂首嘶鸣，躯干壮实而四肢修长，腿蹄轻捷，三足腾空、飞驰向前，一足踏飞燕着地。一匹躯体庞大的马踏在一只正疾驰的小燕子背上，小燕子吃惊地回过头来观望，表现了骏马凌空飞腾、奔跑疾速的雄姿。其大胆的构思，浪漫的手法，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令人叫绝。艺术家巧妙地用闪电般的刹那将一只凌云飞驰、骁勇矫健的天马表现得淋漓尽致，体现出汉代奋发向上、豪迈进取的精神。该作品不仅构思巧妙，而且工艺十分精湛；不仅重在传神，而且造型写实。按古代相马经中所述的良马的标准尺度来衡量铜奔马，几乎无一处不合尺度，故有人认为它不仅是杰出的艺术品，而且是相马的法式。

隋唐时期的铜器主要是各类精美的铜镜，一般均有各种铭文。自此以后，青铜器除了铜镜外，可以说不再有什么发展了。